

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陈伟 / 著

Hangzhou Jidujiao Shi

杭州基督教史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杭州基督教史

陈伟 /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杭州基督教史 / 陈伟著. -- 北京 :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12 (2017.3 重印)

ISBN 978-7-5154-0726-5

I. ①杭… II. ①陈… III. ①基督教史-杭州-近代
IV. ①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3155 号

出版人 曹宏举
责任编辑 姜楷杰
责任校对 康莹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
市场部 (010)66572281 66572161 66572157 83221785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 印张 2 插页 插图 149 幅 26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编辑指导委员会

主 任 沈 翔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其煌 史及伟 孙 璐 李志庭

何忠礼 陈 铭 林正秋 周 膺

唐龙尧 徐吉军 顾志兴 顾希佳

薛家柱

绪 论

基督教这个名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国外基督教是对奉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各教派的统称，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和其他一些较小教派，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而我国通常所称的基督教则单指新教（也称耶稣教）。

新教也称“更正教”“抗罗教”“耶稣教”，该教因对罗马公教（即天主教）抱抗议态度，不承认罗马主教的教皇地位，故在西方一般称“抗罗教”或“抗议教”。其主要宗派有信义会、长老会、圣公会、浸会、公理会、卫理会等，分布在英、美、德、北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我们这里所讲的是基督教新教。

基督教传入中国经历了四个阶段：据史料记载，基督教最早于唐朝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是聂斯托利派^[1]基督教，当时称为“景教”。由于受到唐皇帝的重视，景教发展很快，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因朝廷下诏灭佛教，而波及景教，致使其在中原地区中断，但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仍有传播，这是第一阶段。元代初，基督教又一次传入中国，当时把再度进入中原的景教和来自欧洲的“天主教”统称为“也里可温教”和“十字教”，后随元朝灭亡而衰落，这是第二阶段。明朝时耶稣会传教士再度来华传教，直到清初清政府发布禁教令，天主教被禁，这是第三阶段。1807年马礼逊将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这是第四阶段。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和新教开禁重新发展。^[2]

杭州是中国基督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大约元至元十五至十九年（1278~1282年）基督教（时称也里可温教）就有传播，当时有个传教士马薛里吉思^[3]先后在镇江和杭州建也里可温寺七处。《梁相记》载：“马薛里吉思在杭州荐桥门建样宜忽木刺大普兴寺”（《至顺镇江志》卷九），这是有关基督教在杭州传播的最早记载。^[4]《马可·波罗行记》有载：“蛮

^[1] 聂斯托利 (Nestorius)，叙利亚人，428~431年任君士坦丁堡牧首。主张基督二位二性论，否认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结合为一个本体，认为神性本体附在人性本体上，玛利亚只是人子基督之母，而不是上帝之母。因而被指控为主张基督具有二个不同的位格，公元431年弗所大公会议将其判为异端，并革职流放至埃及。

^[2]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3页。

^[3] 马薛里吉思 (Mar Sargis)，中亚撒马尔干人，也里可温教传人，自祖父辈起，其家族在元宫廷担任医官。后马薛里吉思随蒙古军队南下，出任镇江路副达鲁花赤。

^[4]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1] 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附册海外西湖史料专辑》，杭州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67 页。

[2] [明]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六“祠庙”，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458 页。

[3] [意] 路易吉·布雷桑：《西方人眼里的杭州人》，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4 页。

[4] 龚缨晏：《欧洲与杭州相识之路》，杭州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9 页。

[5] 龚缨晏：《欧洲与杭州相识之路》，杭州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7 页。

子国都行在城（即杭州）人数虽有如是之众，仅有聂斯托利派之礼拜堂一所。”^[1]这应是大普兴寺。《西湖游览志》中记载：“三太傅祠，在荐桥东旧十方（字）寺基，当熙春桥西，元僧也里可温建，久废。”^[2]这与马可·波罗的记载相符，也表明了这座元朝建的基督教堂在明朝废弃。

元泰定二年（1325 年）意大利修士鄂多立克来到中国，他去泉州拜访了两位方济各会修士，随后途经杭州、南京、扬州，最终来到汗八里（今北京），并在此定居差不多三年。之后，他经陆路返回欧洲，元至顺元年（1330 年），他在意大利用拉丁语向修士索拉拿口述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即《鄂多立克游记》。这本游记记载了当时的杭州城及在这里传教的基督教：“城市的一侧流淌着一条河，这一点跟费拉拉城非常相似，因此，该城延伸得相当长。我极力向基督徒、撒拉逊人和异教徒询问该城的情况，他们的答复全都是一样的。依照当地惯例，每户向大汗交纳一巴里失，即五张钞票，其价值相当于一个半弗罗林。因此他们就形成了这样的风俗：十家或十二家组成一‘火’，以便只交一火的税。该城有八十五万火，另有四万火撒拉逊人，加起来是八十九万火。……此外还有基督徒、商人和过路者。我很怀疑这么多人是怎样共居一地的。”^[3]这里讲的基督徒就是聂斯托利派信徒，可见，当时杭州城的基督徒还是比较多的。杭州的也里可温教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逐渐衰落，由于当时传教对象主要限于皇室等上层统治者和一些少数民族，很少有汉人信仰，因而在社会上的影响并不大。

明万历十年（1582 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他到中国后，注意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化。后来他到南京、北京等地，一方面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一方面从事传教活动，不仅得到政府的尊敬，同时还结交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如当时在京城做官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师从他学习天文、地理，与他关系十分密切。三人入教后，帮助其传教也最为得力，被称为天主教“三柱石”，其中李之藻、杨廷筠二位是杭州人。他们邀请传教士来杭，并为租赁房屋作为礼拜堂，从事布道。从此，天主教就开始在杭州传播。明天启七年（1627 年），杨廷筠出资在天水桥附近建教堂一所，这就是天水桥天主教堂的前身。同年杨廷筠去世，其子捐献大方井（现老东岳附近桃花岭）一块田地为天主教传教士墓地，^[4]这一墓地至今尚存。这一时期杭州的天主教堂，除天水桥教堂外，还有几处小教堂。虽然经历“南京教案”，但由于李之藻家人、杨廷筠等的大力保护，所以在明朝查禁基督教的严峻岁月里，杭州的传教事业仍在发展。据耶稣会 1621 年的年度报告，杭州入教者达 300 人。^[5]因此有不少西方传教士聚集杭城，杭州几乎成为当时中国的基督教传播中心，也是天主教传播的主要地区之一。

清朝前期，政府对天主教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对通晓天文、地理、机械等的西方传教士，凡愿意为中国服务的，一律予以尊重和使用；

但对其传教则一般保持谨慎的态度，加以种种的限制，不准教会干涉国家内政，不准反对中国的传统风格，不准煽惑民众，如稍有违反均得查禁。

这一时期杭州天主教由卫匡国主持。他是意大利人，继承利玛窦的主张，在传教中注意与中国的文化相结合，他的传教活动也比较顺利。如顺治五年（1648年）经他受洗入教的就有250人。顺治七年，卫匡国担任中国耶稣会副会长，顺治十一年在罗马参加了是否尊重中国礼仪的辩论。顺治十四年，卫匡国回到杭州，受到了时任浙江巡抚佟国器的支持，传教活动又有较大进展，最主要的表现为重建天主教堂。顺治十六年重建教堂完工。这座天主教堂十分华丽，为当时中国西式教堂之首。

明末清初年，天主教内部发生了是否允许中国教徒保留祭祀、祭孔和其他风俗的“中国礼仪之争”。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这一争论发展为教皇与清王朝的公开冲突。1704年，教皇坚持严禁中国教徒进行这个礼仪。1715年教皇通谕对坚持中国礼仪的教徒以“绝罚”。这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极大愤怒，他声明，祀孔祭祖是中国习俗，不属宗教意义。认为教皇禁止中国教徒祀孔祭祖，是干涉中国内政，坚决不能退让，就下令禁止在国内传布天主教。后来雍正、乾隆两朝都对天主教采取了严厉的查禁政策，雍正三年（1725年）发布禁令，下令驱逐西洋传教士，并禁闭教堂。于是浙江省总督李卫没收杭州天主教堂，改为天后宫，并刊石立碑。自此以后，天主教在杭州中断一百三十余年。因着清政府下令禁教，基督教在中国又一度衰落。^[1]

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嘉庆十三年（1807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2]到达广州，在英属东印度公司任职，曾编译出第一部中文《新约全书》，但当时活动范围很小，发展不大。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范围迅速扩展，在华设立的传教机构也越来越多。近代基督教传入杭州是在太平天国时期，以宁波为入口渐次推进至杭州。咸丰九年（1859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差会派倪维思从宁波登陆来杭，寓于紫阳山的道观传教。同年，英国圣公会差会传教士包尔腾来杭，居住城鄞山布道。同治五年（1866年），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差会传教士克牧师来杭，在银洞桥租屋布道。同年，英国内地会差会传教士戴德生从沪来杭，在清泰街新开弄内租屋设堂传教等等。同治六年，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差会传教士胡思登及郝里美来杭，购地于管米山，开始布道。^[3]基督教新教在杭州开设医院、开办学校，举办“慈善公益”事业，布道活动十分活跃，信徒发展也较快。据1947年对杭州基督教界现状调查统计，当时共有基督教会11个宗派，大小礼拜堂25所，信徒约4000人。杭州基督教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共有28个单位。杭州基督教受职教师共有23人。^[4]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宗教自由政策，对基督教也是如此。1954年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

^[1]王旭烽：《杭州史话》，杭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页。

^[2]马礼逊（1782~1834），英国传教士，1807年抵广州，基督教新教运动兴起后第一个来华传教士。来华后职东印度公司，翻译圣经成汉语，另编著《华英字典》等多种有关汉文的语文书籍，1834年病逝于广州。

^[3]任振泰主编：《杭州市志》第9卷，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版，第449页。

^[4]杭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编：《杭州青年》复会后3、4合期，1947年10月11日。

员会。“文革”时这一机构依然存在。从20世纪末开始，对基督教的学术研究发展起来，领域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队伍不断壮大，这主要表现在研究论著发表的数量、机构的增加及其所涉及的内容的变化上，并且出现了一批精品力作，如顾伟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郭为东的《中土基督》等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国家对宗教政策的调整，基督教历史研究成果不仅数量迅速增多，而且研究内容、方法也日益多样化，研究的深度也十分引人注目。

然而目前杭州基督教史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原始文献利用得不多；二是观点和内容比较类同；三是一些研究基督教历史学者对基督教信仰了解较少，对教会的特性了解不够深入，这样难免在观点上存在不全面和片面性。结果是，沿袭旧说者多，开拓创新者少，甚至以讹传讹。目前学术界对杭州基督教史的研究，多只对杭州基督教的概况做简单描述，零星介绍如《杭州民族·宗教志》《杭州文史资料》《杭州文史丛编》《杭州史话》《杭州寺观教堂》，而将杭州基督教史做系统而又全面论述的专著到目前为止一本也没有，还是空白。因此，撰写一本杭州基督教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杭州是中国基督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基督教事业在中国开创最早的城市之一；特别是近代基督教，西方传教士进入杭州，他们一边传教，一边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教育、医学带入杭州，对加快杭州的近代化步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研究杭州基督教史，对共建共享生活品质杭州城是很有意义的。

杭州是一座具有八千年文明史、五千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多种文化在这里融汇，文化积淀深厚。宗教文化是历史文化的基本元素，也是促进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开发利用好宗教文化资源，有利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丰富城市外在形象、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增进对外开放和友好交流。

本研究的落脚点是基督教新教，时间段为1859~2011年百余年的历史。由于历史原因，相关资料并不多，笔者历十年时间，不间断到杭州市档案馆、浙江图书馆、上海档案馆查阅资料，并通过网站查找相关外文资料，期间，在工作之便采访了一些知情的教会老牧师及信徒。在积累大量资料的基础之上，采用以问题为纲、史论结合的写作方法，旨在尽可能全面地呈现杭州基督教发展的方方面面。书中并未避讳“文革”时期的情况，并随文附有大量老照片，以期让读者更真切地了解杭州基督教史。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基督教各宗派在杭州的发展	1
第一节 美国北长老会	1
第二节 美国南长老会	3
第三节 英国圣公会	4
第四节 中国内地会	6
第五节 美国北浸礼会	8
第六节 浙江五旬节圣洁会	9
第七节 美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13
第二章 传教士与近代杭州社会	15
第一节 慕氏弟兄	15
第二节 开创杭州先河的梅滕更	19
第三节 献身麻风防治事业的马雅各	23
第四节 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	25
第五节 费佩德镜头下的杭州基督教会	29
第六节 司徒尔一家与杭州的不解之缘	34
第七节 从育英义塾到之江大学的裘德生长	37
第八节 教育家甘惠德	40
第九节 杭州青年会首任干事鲍乃德	41

第三章 杭州基督教自立运动	45
第一节 自立运动的起因和发展	45
第二节 杭州市中华基督教会的成立	46
第三节 杭州第一处自主教会的建立	51
第四章 杭州基督教本色教会运动	53
第一节 教会本色化的倡议和提出	53
第二节 本色化在杭州教会的实践	54
第五章 独立性教会在杭州	61
第一节 浙江旅行布道团	61
第二节 杭州以马内利教会	62
第三节 灵粮堂	62
第四节 基督徒聚会处	64
第五节 基督徒华东恩典院	67
第六节 真耶稣教会	68
第六章 抗战时期的杭州基督教会	70
第一节 杭州教会积极开展战时服务救助工作	70
第二节 日本篡夺教会领导权	71
第三节 汪伪组织挤进教会活动	74
第七章 三自爱国运动在杭州的兴起与发展	75
第一节 三自运动的历史背景	75
第二节 《宣言》的发表及签名运动	76
第三节 建立三自组织、开展革新运动	76
第四节 参加爱国运动、支持抗美援朝	78
第五节 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细菌战争	78
第六节 实行完全自养，割断差会关系	80
第八章 “文革”前后杭州基督教会状况	82
第一节 从“大跃进”到“文革”前夕	82
第二节 从“文革”开始到教会重新恢复	84
第三节 教会重新恢复到全面恢复	85
第九章 神学思想建设在杭州教会的开展	87
第一节 起因	87
第二节 目标和原则	88
第三节 开展情况	88

第十章 杭州基督教社会事业	91
第一节 教会学校	91
第二节 教会医院	104
第三节 慈善事业	110
第四节 社会公益捐助	114
第五节 文字事工	116
第十一章 杭州基督教神学教育概况	119
第一节 中国神学院	119
第二节 杭州圣经学校	120
第三节 杭州太平洋圣经学校	121
第四节 浙江神学院	122
第五节 杭州基督教培训中心	125
第十二章 杭州基督教组织机构	127
第一节 杭州基督教青年会	127
第二节 杭州基督教女青年会	133
第三节 杭州基督教协会	137
第四节 杭州市基督教协进会	139
第五节 杭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140
第六节 杭州市基督教协会	142
第十三章 杭州基督教团契	144
第一节 杭州基督教友谊社	144
第二节 杭州基督教学生公社	146
第三节 浙江大学基督教团契	148
第四节 杭州基督教联合圣歌团	149
第五节 杭州市基督教义工团契	149
第十四章 杭州城区各教堂史	150
第一节 现存的教堂	150
第二节 历史上杭州市区其他教堂	163
第十五章 基督教人物小传	170
第一节 杭州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主席鲍哲庆	170
第二节 爱国爱教的宣绥降牧师	172
第三节 杭州基督教会思澄堂第一任牧师范光荣	173
第四节 中国最早的奥运国际篮球裁判舒鸿	174
第五节 张澄斋牧师和他的后裔	177

第六节	之江大学首任中国人校长——李培恩	178
第七节	百岁老校长周觉昧	180
第八节	曾三次参加奥运会的基督徒教练宋君复	182
第九节	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原总干事王揆生的往事	185
第十节	张之江将军的基督教情结	187
第十一节	服务人群、彰显基督的邓述堃主教	189
第十二节	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	191
第十三节	徐钺与杭州蕙兰中学	194
第十四节	学做好牧人的蔡文浩牧师	195
大事记（1859~2011年）		199
参考文献		206
后记		211

第一章 基督教各宗派在杭州的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基督教新教经过马礼逊等人的努力已经传入中国，外国人不能以传教士的身份进入中国，更不能进入中国内地，因此，基督教新教的传教事业人数不多，影响不大，传播不广。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在“传教条款”的保护下，纷纷涌入中国，甚至潜入内地。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受各国国外传教会差派大举进入中国。这些各宗差会主要分别来自圣公宗、浸礼宗、公理宗、长老宗、监理宗、内地会等等。杭州基督教各宗派是在太平天国时期，以浙江宁波为人口渐次推进至杭州，主要有长老宗、浸礼宗、内地会、圣公宗等等，同一宗派又有不同的传教会，情况甚为复杂。

第一节 美国北长老会

长老宗是基督教新教的主要派别之一，源于16世纪的瑞士，然后扩及法国、荷兰、英国、加拿大等地，旗下的差会团体有美国长老会、美国归正教会、英国长老会、加拿大长老会等等^[1]。长老宗源于改革宗教会(Reformed Church)，故长老宗的教义与改革宗教义相同，而改革宗教会乃约翰·加尔文^[2]所建立的，故加尔文主义的基本论点，如救赎预定论等也为长老宗所信奉遵从，传统上敬拜都是唱颂诗篇。

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A.P.M)是一个传教会，其目的是要全世界皈依基督，教会的每个成员都是这个传教会得以生长的组成部分^[3]。1837年他们正式成立了长老会国外差会，并确定以中国为差派传教士的对象。1838年委理华(Walter Macon Lowrie, 1819~1847)^[4]担任差会干事并制定在中国开展传教和出版工作的计划，同一年他们派遣两名传教士来华，因清政府禁止登岸，他们只能滞留在新加坡。

^[1] 查时杰：《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财团法人基督教学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2]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法国神学家、宗教改革家。1536年发表《基督教义》，这是新教系统神学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巅峰之作。后领导日内瓦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后，影响扩大到欧美。其思想系统的核心是神对受造物的预定与拣选。

^[3] 姚民权：《上海基督教史(1843~1949)》，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1994年，第19页。

^[4] 委理华，美国长老会教师，1842年5月抵厦门，1845年4月偕夫人到甬城，5月任宁波支会长老。1847年去上海差会完成对圣经译本的修改，7月乘船由沪回甬，途中死于乍浦海面。

[1] D. Mac Gilliv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p.379-380.

[2]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130.

[3] 龚缨晏:《浙江早期基督教史》,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

[4] 鲍明鑑编纂:《基督教长老会浙省宁绍中会七十年略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77页。

[5] 陈定尊编纂:《鄞县宗教志》,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6] 倪维思,美国北长老会教士。1854年来华,先后在上海、宁波、杭州等地传教,并在宁波开设寄宿学校。1861年在山东登州传教,1871年往烟台传教,直到1893年去世。

[7] 鲍明鑑编纂:《基督教长老会浙省宁绍中会七十年略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85页。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耆理华作为长老会第一个来华传教士登上中国大陆。^[1] 1842年1月, 耆理华乘坐“女猎手”(Huntress)号离开纽约。在海上, 曾做多次天文观察。同年5月, 到达澳门, 暂住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的家中。此后, 他多次到新加坡等地传教。^[2]

耆理华到达中国时, 第一次鸦片战争快要结束。他觉察到中国的大门就要被打开, 对华传教的良机正在到来, 于是一再向美国长老会呼吁, 要把传教重点放在中国。1843年8月, 他本人还离开澳门, 想实地考察被英军占领的舟山, 快到时, 由于季风改变风向, 无法继续航行, 在海上逗留几天后回到厦门。

1844年, 美国长老会派出的一批传教士先后来到澳门, 他们是: 麦嘉缔(Divie Bethune McCartee)、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夫妇、韦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夫妇、柯理(Richard Cole)夫妇、卢壹(John Lloyd)、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露密士(Augustus Ward Loomis)夫妇。经过一番商量, 他们做了分工: 哈巴安德等人去广州和厦门, 而前往宁波的人最多, 共有五人: 耆理华、韦理哲、克陛存、露密士、麦嘉缔。^[3]

1844年6月, 美国长老会总差会派传教士麦嘉缔医师从澳门出发往宁波传教。韦理哲于同年8月离开澳门, 其他传教士则是1845年2月才从澳门动身的。因此, 麦嘉缔成为第一个来到宁波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45年5月17日成立长老会宁波支会, 推荐教师克陛存为牧师。在当月18日举行的聚会上, 选举麦嘉缔为治理长老, 韦理哲和耆理华也暂时担任治理长老, 宁波教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长老会在宁波的教会组织正式建立。^[4] 1849年9月, 宁波长老会成立, 推选韦理哲为第一任会正。1858年6月, 中国与英、法、俄、美等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 条约允许传教士自由传教, 长老会见在中国传道之门洞开, 认为宜乘机播种^[5]。

杭州是浙江省的首府, 经济富庶、人口众多。宁波差会在1850年初就计划在杭州开辟一个传教站。1854年冬, 差会曾派路介臣及其助手去杭州散发基督教小册子; 1855年他和美国浸礼会的一位本地助手再来杭州分发书刊。但由于当时中国除了五口外, 不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居住, 因此无法在杭州建立传教站。

《中美天津条约》签订后, 传教士觉得进入杭州的时机已经成熟。1859年2月差会决定派倪维思(J. L. Nevius, 1829~1893)^[6]夫妇从宁波前往杭州。最初住在钱塘江畔、六和塔下的一座寺庙中, 不久之后又在城中紫阳山上的一座道观租房居住。6月, 倪维思夫妇回到宁波,^[7]向宁波差会的传教士介绍了在杭州的情况, 并要求移居该地, 开辟站点。传教士们都对在杭州开站充满期望, 支持了倪维思夫妇的意见。

在宁波待了一二周后, 倪维思又回到杭州, 雇工匠修整房屋, 开始建站传教工作。而宁波差会派到杭州的两位本地助手也在城中一姓魏人

家租住。^[1]倪维思夫妇本打算在此长期居住，未料当地官员态度转变，将房东王某逮捕入狱，并要求倪氏夫妇离开杭州，而且当时杭城内有谣言传播，说洋人绑架中国人送到海外做苦力。夫妇俩还欲坚持，但在8月下旬，美国驻宁波领事裨辣理卫廉来信告知，浙江巡抚已经通过宁绍台道发出照会，告知“有一个姓倪的美国人在其辖区内居住，经当地官员反复劝说，仍然不肯离开”。他回复中国官方承认确有倪姓美人在杭州，也知道此时尚无权利在该地居住，但为安全起见，请求允许他们等到酷暑过后再行返回。在此种情况下，倪维思夫妇于9月回到宁波，房屋和家具交给一名当地人照看，两名本地助手留在杭州。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时，因地域差异，长老会分裂出北长老会和南长老会。原长老会亦称北长老会。

1864年11月美国传教士葛珪(Sara L. Green)与张澄斋由宁波来杭暂住马所巷圣公会，12月租皮市巷五开间楼厅一所作为礼拜堂。1866年元月宁波长老会派教师陶锡祈(Samuel T. Dodd)、葛珪及谢行栋来杭成立支会，在9月25日由宁波长老会任命张澄斋为教师主理杭州支会^[2]。1868年12月教友推举张澄斋为牧师^[3]，张成为该堂第一任牧师来自杭州、新市、瓶窑等地信徒40人，在皮市巷堂参加了按牧典礼。

1867年秋，宁波长老会陶锡祈率宁波崇信义塾的学生来杭，在珠冠巷租一所书塾，名为育英义塾(Presbyterian Boys' School)。1869年葛珪、陶锡祈等同居皮市巷租清吟巷瞿宅大厅，书塾即迁于此。^[4]1871年美国传教士来恩赐来杭(D. N. Lyon)，与张澄斋购得丰乐桥直街三官巷口三开间大厅，作为礼拜堂及牧师住宅。^[5]教堂于1872年落成。^[6]1874年杭州上皮市建筑育英义塾。^[7]1879年教师裘德生(Junius H. Judson)由美来杭。1880年裘德生负责杭州书塾，张澄斋兼任。1883年聘山东刘维师先生为育英义塾之长。1885年在杭州城南、吴山东南脚下的布市巷建造鼓楼堂。1899年，美国北长老会在杭州大塔儿巷创办育才女校。

1921年由于皮市堂信徒人数增加，众人议再建新堂。当时张澄斋的儿子张葆卿医生带头奉献一万银元，在国内募捐二万银元，在国外募得三万元，共六万元。从1924年动工到1927年建成，起名“思澄堂”，寓纪念张澄斋牧师之意。1931年美国北长老会筹募捐款将鼓楼堂改建为中国宫殿式教堂。

第二节 美国南长老会

杭州是美国南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South, P.S)的发祥地，而应思理(Inslee Elias B)牧师是其最初传教士，他原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57年抵宁波，并于1861年返美，与该会脱离关系，1865年加入伦敦会，驻于松江，1866年移驻上海附近工作约四个月，经伦敦

[2] 鲍明鑑编纂：《基督教长老会浙省宁绍中会七十年略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92页。

[3] 鲍明鑑编纂：《基督教长老会浙省宁绍中会七十年略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95页。

[4] 鲍明鑑编纂：《基督教长老会浙省宁绍中会七十年略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94页。

[5] 鲍明鑑编纂：《基督教长老会浙省宁绍中会七十年略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203页。

[6] 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756页。

[7] 鲍明鑑编纂：《基督教长老会浙省宁绍中会七十年略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205页。

返美。1867年他奉美国南长老会差派来杭州开创第一总站，先在羊市街紫金桥租屋设堂，并设男女学校，后迁至大井巷环翠楼附近租赁民房，并就近购买管米山地方建筑洋房，三年后回国。^[1]1868年吴思敦（Hale Houston）、郝理美（Benjamin Helm）、司徒尔（John L. Stuart）及另一位传教士也受派而来。^[2]

南长老会组织的布道团最初落脚在杭州市内的城隍山的管米山，并建立了一个据点，后迁至天水桥畔（今耶稣堂弄）。

由于此前太平天国军队攻打杭州时，扎营在城外的耶稣堂弄一带，民房均被烧毁，农田早已荒芜。虽芦藩台批了地块，但传教士住宿仍无着落，还需要另租民房解决。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差会拨来经费，先在这块地上建房，并开放了布道所。

继胡、郝二位传教士之后，由于布道所需要，1874年差会又差遣第二批人员来杭州，传教士名单中，就有司徒尔夫妇和他的同事们。

胡、郝二位传教士任期满后，司徒尔于1875年主持天水堂工作。不久即主持开办了仁慈堂、医局、女子学校和育婴堂等服务机构。^[3]1884年按立南长老会第一位华人牧师陈达三。^[4]1896年新桥设立布道所由俞紫湘先生负责，以后办小学，由桑坚棠先生负责。1898年成立太平桥教会，及湖墅左家桥教会。1917年南差会在法院路上购地大兴土木造礼拜堂定名为“湖山堂”，作为司徒尔纪念堂。1922年又在湖墅大米坊购地建造城北堂。1925年美国牧师明思德创办慈善团体“新民社”，并以新民社创办新民小学。^[5]此外，南长老会立分堂于杭州城外笕桥、乔司、临平三镇。笕桥由童爱三负责，乔司由信徒自理，临平由钱楚雄负责。以上三处与太平桥合成一堂会，由西教士裴来仪（John Mercer Blain, 1869~1932）^[6]负责。后又立分堂于余杭、仓前、闲林埠、留下及塘栖镇有分堂五处。^[7]

第三节 英国圣公会

“圣公宗”系由英文 Holy Catholics Church 翻译而来，最初译为“圣而公之教会”，后来改定为“圣公宗”或“圣公会”；该宗派产生的时间，大约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发源地在英国，所以圣公宗教会同时也被称为安立甘会（Anglican Church）或英国国教派，又因教会组织采用监督制度，所以也被称为监督会。

圣公宗的教会崇拜仪式与天主教仪式相似，但教义则采用安立甘主义，主要包括：忠于圣经的权威，采行圣餐、浸礼两种教会圣礼，组织则为三级的主教制。圣公会实行会督（主教）、会长（牧师）、会吏三品圣职，另外设有会吏总职协助会督工作，但不能施主教职权。至于圣公宗旗下来华传教的团体，有美国圣公会、英国圣公会、英行教会、加拿大圣公会等等。^[8]这宗派后来在中国也被称为圣公会，圣公会的英国差会就称为

[1] 陈达三：《长老会历史——南长老会入华传道史略》（神学志特号甲编）第10卷第3号，1924年，第68页。

[2]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326页。

[3] 沈建中、许俭：《司徒雷登与西湖》，杭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页。

[4]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5] 陈达三：《长老会历史——南长老会入华传道史略》（神学志特号甲编）第10卷第3号，1924年，第70页。

[6] 裴来仪：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1896年11月来中国，先后在嘉兴、平湖、杭州负责传教、教育工作。1932年在杭州病逝。

[7] 陈达三：《长老会历史——南长老会入华传道史略》（神学志特号甲编）第10卷第3号，1924年，第70页。

[8] 查时杰：《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台湾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安立甘宗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East, C.M.S), 有时被译为英行教会。

英国安立甘差会成立于 1795 年, 它的名称直译当为“向非洲及东方传教会”, 这表明成立伊始它就对向中国传教就有很浓厚的兴趣。1824 年马礼逊返英期间, 曾被他们请去做报告, 1835 年初安立甘会写信给马礼逊商讨派传教士来华事宜, 当时因马礼逊已去世, 由郭士立 (Carl. F. Gulzaff, 1803~1851)^[1] 代其复信, 建议以新加坡与杭州为传教大本营^[2]。

1845 年, 英国圣公会差会派遣传教士麦丽芝 (T. Meclatchie) 与施美夫 (George Smith) 到上海传道设堂, 但上海也为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捷足先登, 施美夫感到宁波城传教机会甚佳, 即向英国差会报告, 要求选派传教士到宁波建立据点, 此为英国圣公会在中国布道之开端。^[3]

1848 年圣公会差会派禄赐 (Russell) 和戈柏 (Cobald), 他们于当年 5 月来到宁波。三年后有教友鲍学义与侯悦理信教。1853 年, 英国差会派岳菲迪、包尔腾 (John Shaw Bardon, 1826~1907)^[4] 两人来宁波。到宁波后, 包尔腾赴杭州建立圣公会据点, 但因杭州人民视“教士为寇仇”, 包尔腾无法立足, 想改居绍兴又未能如愿, 只得返回甬城。^[5]

1859 年包尔腾再次由甬来杭, 住城鄞山数月, 开启圣公会在杭传教^[6]。1864 年, 由英国传教士慕稼谷 (George Evans Moule) 偕缪雅各、盛约翰二人 (华籍) 由宁波到杭州, 住马所巷 39 号。1870 年第一个英国女传教士禄慕德由甬来杭。

1869 年圣公会派传教士麦多 (Meadows) 在杭州大方伯平赁租屋三间, 设立戒烟所, 内有 16 张病床, 开始治病传道。1870 年创立大方伯医院。1871 年英国圣公会派甘尔德 (Galt) 医师接管杭州大方伯医院工作, 医院正式改名为杭州广济医院。^[7] 1871 年英国传教士慕雅德 (Arthur Evans Mule, 1836~1918) 由甬来杭建筑信一堂。1881 年圣公会传教士梅滕更 (David Duncan Main) 由上海抵杭州, 接办该会所办的戒烟所。1883 年以广济医院原址为基础, 筹建新的广济总医院, 并在院内创建医校。^[8]

1898 年成立了圣公会杭州教区, 该牧区首任牧师是沈再灵, 1920 年该牧区宣告自养、自立。1909 年建筑志水堂, 该堂为夏志水牧师之女为纪念其父而造, 费用均由其子女负责向外人捐募, 完成后即奉献于圣公会杭州教区。1909 年英国人冯马利亚 (Marry Vaughan) 出资建筑女校, 校舍落成时冯马利亚即告去世, 称此校为冯氏女校作为纪念, 首任校长为巴罗以 (Barnes) 女士。^[9]

1910 年立慕德堂, 该堂先在羊市街紫金桥向姓胡租屋礼拜, 后又在羊市街东牌楼口, 向姓钱租屋礼拜, 直到 1950 年在下羊市街豆腐 2 号信徒林秀昌先生奉献自己的房屋作为礼拜堂。

五旬堂是禄慕德女士 1915 年因柴家坝有教友信道而设的。

圣公会杭州教区历任牧师如下表:

^[1] 郭士立, 德国传教士, 1824 年到泰国传教, 学会福建方言。1831 年后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 侦察中国海岸及海防情况, 探寻鸦片以外对中国贸易的机会, 并顺道散发圣经。1840 年随英国侵略军北上, 任定海、镇江等地县知事, 并在南京条约订立过程中任翻译。

^[2] 姚民权:《上海基督教史 (1843~1949)》, 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 1994 年, 第 12 页。

^[3] 中华圣公会总议会中央办事处编印:《中华圣公会年鉴 (1949)》, 第 3 页。

^[4] 包尔腾, 英国传教士, 1853~1861 年在杭州宁波等地传教。1862 年被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推荐为北京同文馆第一任英文教习, 1865~1872 年为驻华美使馆牧师, 1874~1897 年任香港区圣公会主教。

^[5] 中华圣公会总议会中央办事处编印:《中华圣公会年鉴 (1949 年)》, 第 4 页。

^[6] 陈定尊编纂:《鄞县宗教志》, 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43 页。

^[7] 王建安、张苏展主编:《百年名院百年品质——从广济医院到浙医二院》,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352 页。

^[8] 王建安、张苏展主编:《百年名院百年品质——从广济医院到浙医二院》,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352 页。

^[9] 沈建中、许俭:《司徒雷登与西湖》, 杭州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35 页。